

特朗普回归与美国亚太联盟调整^[1]

吴玥瑾 凌胜利

【内容提要】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与亚太盟国在安全合作上互动密切，但双方高层交流较为有限，在经贸往来和地区多边机制等问题上摩擦不断。在坚持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特朗普第二任期仍需借助亚太盟国的力量，更加突出联盟传统的地缘政治竞争功能，进一步发挥地区热点议题在对华竞争中的“杠杆作用”。同时，特朗普继续奉行“美国优先”和“交易主义”原则，不断向亚太盟国转移防务责任，加剧联盟内部经济与安全合作分化的态势。受此影响，亚太联盟的安全合作在短期内得以深化，地区安全秩序将受到直接冲击。然而，长远来看特朗普的亚太联盟政策将导致联盟内部出现更大裂痕，致使中美关系面临更多变数和挑战。对此，中国需要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同时，加强与美亚太盟国的经贸合作和政治对话，积极推动构建“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

【关键词】亚太联盟 特朗普政府 美国优先 联盟政治 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吴玥瑾，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凌胜利，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5) 03-0024-23

[1] 本文系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24&ZD28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联盟体系是美国霸权护持的关键支柱，在其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转向“大国竞争”战略，同时以“美国优先”牵引联盟体系建设，要求盟友承担更多安全义务。拜登政府时期，美国通过推行“价值观外交”、拓展经济与科技合作、共享军事技术等手段深化与亚太盟国的战略协作，并积极推动其向更为广泛的盟伴网络拓展。随着特朗普的回归，美国亚太联盟在“美国优先”原则和“交易式外交”风格影响下已发生新变化。特朗普重新执政以来，与亚太盟国的一系列互动为研判其调整方向提供了参考。相较于第一任期，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亚太联盟政策既存在延续性，也呈现新变化。综合比较两个时期的政策，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特朗普回归后美国亚太联盟政策的走向。目前看来，特朗普第二任期在亚太地区将继续以“遏华”为首要战略目标，倚重盟友发挥对中国的制衡与围堵作用，这势必给中国国家安全和周边外交带来严峻挑战。因此，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亚太联盟调整进行探讨十分必要。有鉴于此，本文将对特朗普再度执政后美国与亚太盟国的互动情况进行相对系统的梳理，结合其联盟战略动向及盟友的配合程度，分析此轮美国亚太联盟调整的特点，并研判其未来趋势与潜在影响，为学术界和政策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特朗普回归后美国亚太联盟新动向

特朗普重新执政以来，多名内阁成员针对特朗普 2.0 时代的亚太联盟政策发声。2025 年 1 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华尔兹（Mike Waltz，2025 年 5 月因“群聊泄密”事件被解职）在上任前即表示，“新政府将加强印太战略，包括对台出售武器，并利用联盟体系对抗中国”，这可被视为特朗普再次当选后发出的有关亚太联盟政策的明确信号。^[1] 2025 年 5 月，美国国

[1] 参见 Ashish Kumar Sen, “U.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s Talk Top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January 16, 2025,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5/01/us-national-security-advisors-talk-top-foreign-policy-challenges>.

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 (Pete Hegseth) 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谈及美国的“印太愿景”时,强调会加强与“印太”盟伴的合作来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表明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在遏华战略布局中对亚太联盟的倚重。^[1] 不过,相较于特朗普第一任期,当前其与亚太盟国的互动相对平淡,且双方在经贸问题、地区安全问题上的矛盾已初现端倪,也折射出特朗普回归后亚太联盟关系面临的不确定性。

(一) 高层交往尚显冷淡

高层交往是观察国家间关系走向的晴雨表。特朗普重新执政以来,美国同各亚太盟国陆续开展高层对话,但是其频率、层级及成果均有所区别。整体而言,美日间高层互动最为频繁且规格最高,美澳、美菲次之,美韩、美泰则相对滞后。

美日借助高层对话表达了深化同盟关系的立场。2025年1月21日,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 (Marco Rubio) 在华盛顿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一致同意提升美日同盟至新高度。2月,特朗普与访美的日本首相石破茂举行会晤,双方就强化美日安全合作、明确《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的适用范围等内容达成共识,双方还宣布“寻求建设美日关系的新黄金时代”。^[2] 这也是特朗普再度执政后会见的首位亚太国家领导人,体现出对美日同盟的重视。3月29日,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在访日期间与日本首相和防务大臣举行会谈,强调日本是“遏制中国‘军事侵略’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3] 此外,两国高层还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七国集团外长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会等多

[1] 参见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egseth Outlines U.S. Vision for Indo-Pacific, Addresses China Threat,” May 30, 2025,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4202504/hegseth-outlines-us-vision-for-indo-pacific-addresses-china-threat/>。

[2]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pan-U.S. Summit Meeting,” February 7, 2025, https://www.mofa.go.jp/na/na1/us/pageite_000001_00800.html。

[3] Tim Kelly, “Pentagon's Hegseth says US command in 'warrior' Japan being upgraded to deter China,” Reuters, March 30,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pentagon-chief-hegseth-says-warrior-japan-indispensable-deter-china-2025-03-30/>。

边场合会晤，围绕亚太安全问题进行磋商。值得关注的是，相较于第一任期特朗普多次宣示美日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石”的积极姿态，当前其对日互动的热情及承诺的明确性都有所下降。

美国与澳大利亚借助高层交往展现出深化安全合作的意愿，但互动的规格有限。2025年1月21日，美澳两国外长围绕进一步推进防御合作举行磋商会议。随后，特朗普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通话，就美英澳“三边安全合作伙伴关系”（AUKUS）框架下的核潜艇等合作、关税问题、关键矿产供应链韧性等多个议题展开讨论。

与此同时，美菲高层也开展了一系列互动。2025年1月23日，国务卿鲁比奥在与菲律宾外长马纳洛（Enrique A. Manalo）的电话会议中重申美国对菲律宾“坚定不移”的防务承诺。^[1]3月，赫格塞思对菲律宾进行了访问，并在同菲总统小马科斯（Ferdinand Romualdez Marcos Jr.）和防长特奥多罗（Gilberto Cruz Teodoro Jr.）会面时，强调美菲联盟对维护“印太”地区安全的重要作用。^[2]此外，美国还召开了美日澳、美日澳菲防长会晤，承诺共同致力于提升军事互操作性和行动协调能力。但是，美国与澳、菲两国迟迟未举行正式首脑会谈，小马科斯虽曾多次呼吁与特朗普进行直接会面，但推进速度较为缓慢。

相较于同日、澳、菲的互动，特朗普政府与泰国及韩国的高层交流则更为冷淡。2025年2月19日，赫格塞思和泰国副总理举行电话会议，就深化防务合作关系展开讨论。5月30日，赫格塞思又同泰国国防部长会面，双方探讨了加强美泰联盟和地区安全的共同举措。这是特朗普就任后美泰两国围绕防务安全开展的为数不多的高层对话，但都未取得实质性成果。

[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cretary Rubio’s Call with Philippine Secretary of Foreign Affairs Manalo,” January 22, 2025,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ubios-call-with-philippine-secretary-of-foreign-affairs-manalo/>.

[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 Philippines Joint Statement on Secretary Hegseth’s Inaugural Visit to the Philippines,” March 28, 2025,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4137869/united-statesphilippines-joint-statement-on-secretary-hegseths-inaugural-visit/>.

与第一任期之初便重申对韩国“坚定的安全承诺”不同，美韩在特朗普新任期内尚未举行有关防务问题的双边磋商，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韩国国内政治危机的影响。对于美国而言，与临时政府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可能缺乏实际意义，因为难以保证其会得到韩国下一届政府的认可和执行。不过，从美国国防部阐述的“印太愿景”来看，韩国在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中仍占据较为重要的位置，预示李在明正式执政后双边高层交流有望逐步恢复。事实上，2025年6月6日，李在明就任韩国总统两天后即与特朗普通话，谈及韩美同盟、经贸磋商等话题，而特朗普在通话中也表达了邀请李在明访美的意愿。

（二）安全合作较为频繁

安全合作是联盟关系的核心内容。特朗普回归以来，美国与亚太盟国的安全合作呈现深化态势，主要体现在联合军演升级、延续所谓“联盟现代化”进程及深化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三方面。

特朗普重新执政以来，美国与亚太盟国频繁开展具有明显地缘竞争指向性的联合军事演训活动，引发地区热点问题升级。在半岛方面，美国与韩国于2025年2月在朝鲜南部边境附近进行联合实弹演习，并在釜山作战基地部署核潜艇及新一代侦察机。美韩还于3月10日启动“自由护盾”年度军演，全方位扩大联合野外机动训练的规模与数量。此举引发朝方强烈谴责，警告“将加倍提升核力量以应对来自美国及其他对手的威胁”^[1]，并开展多轮新型导弹试射予以回应。在西太平洋关键水域，美日联合演训呈现高频态势，两国先后与澳大利亚在关岛开展“北方对抗25”（Cope North 25）演习，与法国在菲律宾以东海空域举行“2025太平洋斯特勒”联合军演，并在靠近中国东海的日本西南岛屿实施“铁拳25”联合演习。在南海区域，2月，美国空军B-1轰炸机与菲律宾空军FA-50战斗机在南海上空实施联合巡逻训练。随后，美国同澳、日、菲等国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开展

[1] 《朝鲜谴责美军事挑衅：将以战略手段应对》，中国新闻网，2025年2月22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5/02-22/10372664.shtml>。

多边海上行动，并与泰国启动第44届“金色眼镜蛇”年度军演。而4月21日至5月9日举行的美菲“肩并肩2025”联合军演不仅首次将日本纳入正式参演国，美国还欲借演习向菲部署高性能无人水面艇等新型作战力量。^[1]5月下旬，美国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舰艇在菲巴拉望岛以西海域举行所谓“联合巡航”，这也是美国海岸警卫队舰艇首次直接进入南海争议水域。^[2]

与此同时，美国持续推进“联盟现代化”进程，以深化亚太联盟的军事合作。美国2022年版《印太战略》报告提出，要通过提升互操作性常规化、引入新兴技术资源、巩固盟伴关系网络等手段，实现“联盟现代化”的战略目标。^[3]特朗普再度执政后，美国重申对亚太盟国防务现代化的支持承诺。在美澳军方高层会晤中，美国就澳大利亚国防现代化进程、扩大联合训练演习规模等议题与澳方展开深入探讨。同期，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原定用于菲律宾安全部队现代化建设的3.36亿美元援助资金从外援冻结中豁免，并在美日澳菲防长会议中承诺共同支持菲律宾国防重点项目建设，凸显出其对菲律宾防务能力的关注。

此外，美国对推进亚太多边安全机制持积极态度。特朗普就职次日即启动美日印澳四方外长安全对话。随后，美澳两国防长在会晤中就如何强化AUKUS的联合作战能力进行深入探讨。2025年2月15日，美日韩三国外长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发表联合声明，承诺深化三边的安全合作和延伸威慑机制。此外，美国还在美日首脑会晤中表示将强化美日韩、美日印澳、美日菲等小多边机制协调，并在美日澳三边防长会议中强调应拓展与印度、菲律宾和韩国等“印太”伙伴的合作。当前，多边安全合作已成为美国与

[1] 刘琳：《美菲“肩并肩2025”，美国新版“印太战略”现端倪》，载《世界知识》2025年第10期，第25—27页。

[2] “Philippines, U.S. hold joint maritime drills in South China Sea,” Reuters, May 21,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philippines-us-hold-joint-maritime-drills-south-china-sea-2025-05-21/>.

[3]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2022, pp.12-13,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亚太盟国共享新技术、增强互操作性、演训试验新战法的重要平台，也是美国构建对华围堵网的主要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曾多次指责盟国在防务责任上分担过少，甚至以撤军威胁韩国提高国防开支。^[1]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先是要求澳大利亚提升国防开支至 GDP 的 3.5%，继而又提出亚洲盟国应当参照欧洲盟国的标准，将国防支出增至 GDP 的 5%，这表明特朗普在其新任期内将持续就防务分担问题向盟国施压，以最大限度地减轻美国的安全负担。此外，鉴于特朗普上任后同亚太盟国的高层战略对话频次不足，对其安全承诺较为模糊，双方安全合作可能面临后劲不继的问题。

（三）经贸合作频频遇阻

经贸议题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中占据核心位置。在竞选期间，其通过减税、放松监管与加征关税来振兴美国制造业、拉动就业的主张，成为特朗普胜选的关键因素。^[2] 特朗普回归后，先是对钢铁、铝材、汽车等产品加征进口关税，进而又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基准关税，并对存在较大贸易逆差的国家征收惩罚性“对等关税”。这些举措给亚太盟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经贸问题始终是美日同盟的核心议题。双方历经多轮谈判，最终于 2019 年达成《美日贸易协定》，以缓解两国贸易失衡并深化经济合作。随着特朗普重新执政，该议题在日本国内再度升温。上任伊始，特朗普即公开宣称将采取措施以大幅缩减美国对日贸易逆差。2025 年 3 月 11 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赴美寻求免除对钢铁、汽车等产品征收的新关税，但未能获得豁免保证。由于美国是日本最大的汽车出口市场，对

[1] James M. Lindsay, “Election 2024: Trump Talks Foreign Policy With Time Magazin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y 3, 2024, <https://www.cfr.org/blog/election-2024-trump-talks-foreign-policy-time-magazine>.

[2] Natalie Sherman, “Has Trump promised too much on US economy?” BBC, January 18, 2025,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17d41y70deo>.

日产汽车加征的新关税将使日本六大车企的损失金额达一倍以上^[1]；而特朗普对墨西哥等国加征关税，也重创了在当地设厂的日本企业。4月9日，美国对日本征收24%“对等关税”的行政命令正式生效。日本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大幅提高关税将导致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的日本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2]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全面关税使日本正面临一场‘国家危机’”。^[3]尽管承受巨大压力，日本政府仍声明“无意与美国直接对抗”^[4]，并同美国陆续进行了多轮谈判，以期纾解关税等问题带来的经济困局。

美国与韩国的经贸摩擦日益凸显。在首次国会联席会议演讲中，特朗普抨击韩国政府对三星电子等芯片制造商提供补贴且对美征收高额关税，并以废除《芯片与科学法案》相威胁。此举重挫三星电子、SK海力士等韩国企业在美投资信心。3月，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宣布对钢铁、汽车加征25%的进口关税，韩国作为这些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之一，遭受到直接经济冲击。此外，韩国因对美存在较大贸易顺差，被课以额外25%的惩罚性“对等关税”，将进一步加重其经济负担。面对双重关税的压力，韩国临时政府虽紧急启动市场稳定计划和对特定行业的紧急支持措施，并试图通过驻美使馆及工作层协商等渠道推进关税谈判，但收效甚微。李在明就任韩国总统后，将美韩贸易谈判列为首要议程。受“务实外交”理念影响，李在明在对美谈判方面保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在竞选期间回避就贸易争端表态，当选后则释放出缓和经贸谈判进程的信号。同时，特朗普惯用的“安

[1] Mireya Solís, “The Gilded Age of the American Tariff: Choices Ahead for Japan,” Nippon, March 10, 2025, <https://www.nippon.com/en/in-depth/a10102/#>.

[2] Satoshi Iizuka, “FOCUS: Trump tariffs may push down Japan's economic growth by up to about 2%,” Kyodo News, April 4, 2025, <https://english.kyodonews.net/news/2025/04/e965fac9a29c-focus-trump-tariffs-may-push-down-japans-economic-growth-by-up-to-about-2.html?phrase=nippon%20life&words=>.

[3] “Japan PM exploring possibility of phone talks with Trump over tariffs,” Kyodo News, April 4, 2025, <https://english.kyodonews.net/news/2025/04/7cb5d0367aad-ishiba-vows-unprecedented-us-tariff-response-amid-national-crisis.html>.

[4] Francis Tang, “Japan to avoid direct confrontation with the U.S. over Trump tariffs,” *The Japan Times*, April 7, 2025, <https://www.japantimes.co.jp/business/2025/04/07/economy/tariffs-political-reax/>.

全一贸易议题捆绑”策略实质性地抬升了谈判的复杂性与达成共识的难度，因此，美韩经贸谈判并不容易。

美国与菲律宾、泰国的经贸关系也充满不确定性。近年来，菲律宾在“印太经济框架”下（IPEF）深化与美国的经贸合作，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获得大量发展援助，并与美日共同打造了“吕宋经济走廊”，对美国经济依赖不断加深。面对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菲律宾政府最初持乐观预判^[1]，试图以被加征关税较低的“优势”吸引更多外部投资，以求独善其身；但实则遭遇了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所导致的输入性通货膨胀。^[2] 菲律宾财政部长拉尔夫·雷克托（Ralph Recto）坦承，菲律宾虽可抵御贸易战冲击，但无法免受国际贸易预期下滑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负面影响。^[3] 作为对美贸易顺差国，泰国则承受更强冲击——在此次全面加征关税中，泰国被征收 36% 的“对等关税”，在亚太盟国中居于首位。泰国央行行长警告称，美国的关税政策将对泰国出口造成重创，并使其面临周边国家贸易转移的直接冲击。^[4] 迫于压力，泰国政府于 2025 年 5 月向美国提交了贸易提案，承诺将扩大美国产品的进口数量和私营部门赴美投资规模，进一步降低对美关税，并严格执行原产地规则，以此来稳定双边经贸关系的基本面。

美澳关系受经贸摩擦的影响相对有限。这源于澳大利亚持续的对美贸易逆差及其庞大的对美投资体量，二者成为澳方稳定两国经贸往来的重要议价筹码。在 2025 年 1 月的美澳外长会晤中，双方就加强在关键矿产和全球供应链方面的伙伴关系进行了探讨。在随后的首脑通话中，两国进一步

[1] Kris Crismundo, “DTI: PH to pursue FTA with US under new Trump admin,” Philippines News Agency, January 23, 2025, <https://www.pna.gov.ph/articles/1242489>.

[2] Luisa Maria Jacinta C. Jocson, “Trump policies pose risks for PHL economy,” *Business World*, February 5, 2025, <https://www.bworldonline.com/top-stories/2025/02/05/651171/trump-policies-pose-risks-for-phl-economy/>.

[3] Neil Jerome Morales and Cliff Venzon, “Philippines sees benefits as Trump tariffs hit peers harder,” *The Japan Times*, April 4, 2025, <https://www.japantimes.co.jp/business/2025/04/04/philippines-trump-tariff-benefits/>.

[4] “Trump tariffs leave deep scars on Thai economy: BOT chief,” *The Nation Thailand*, June 3, 2025, <https://www.nationthailand.com/blogs/business/banking-finance/40050784>.

讨论如何深化互利贸易和投资合作。针对特朗普对澳征收10%“对等关税”的举措，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其“影响可控”。尽管澳总理阿尔巴尼斯公开批评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但他也承诺不会诉诸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而是继续寻求与美国协商争取关税豁免。^[1]然而，由于澳大利亚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融合，若全球贸易环境因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恶化，澳大利亚最终仍将承受传导性冲击。

（四）国际协调总体不佳

长期以来，美国依托亚太联盟体系介入地区事务，并通过在全球治理、国际机制建设中寻求盟国支持以扩大其战略影响力，实现本国的战略目标。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仍延续此路径：一方面积极协调与亚太盟国在地区热点议题上的立场，另一方面又系统性地退出各种多边国际机制。这表明其依然延续着“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倾向，对国际协调的有限参与不过是服务于其地缘战略竞争的工具。

一是积极在台湾、南海、朝鲜半岛等地区热点议题上协调与亚太盟国的立场。在2025年1月的美日印澳四国外长会议上，美方联合其他国家表达了对中国在南海、台海地区行动的“担忧”，声明对“加强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承诺。在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美方又与日本、韩国就台湾问题统一立场，妄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支持台湾适当地参与国际组织”，并在随后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中同其他各方重申了这一立场。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公开抹黑中国在黄岩岛海域的正当活动，表明对菲律宾的“坚定支持”，并联合日澳菲等盟国表达对中国南海行动的“严重关切”。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美日韩在联合声明中承诺共同致力于“朝鲜的彻底无核化”。美国还同韩国多次开展军事演习，对朝鲜实施战略威慑。不过，特朗普频繁提及与金正恩“良好的”私人关系，表达与其会面的意愿，甚至多次将朝鲜定义为“核大国”，引发韩方强烈不满。种种迹象表明，新

[1] Renju Jose and Kirsty Needham, “Australia says US tariffs ‘not act of a friend’ but rules out reciprocal move,” Reuters, April 3,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ustralia-says-us-tariffs-not-act-friend-rules-out-reciprocal-move-2025-04-02/>.

一届特朗普政府的朝核政策尚存诸多变数，不排除绕过韩国与朝鲜直接对话交易的可能^[1]，美韩在朝核问题上暗藏分歧。

二是对多边国际机制持消极态度，漠视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调。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伊朗核协议等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又掀起“退群”浪潮，接连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机制，并威胁中止拜登政府时期制定的“印太经济框架”等地区机制。同时，特朗普违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大规模加征关税，继其第一任期阻挠法官遴选导致“瘫痪”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后，又在第二任期通过暂停缴纳会费的方式干扰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运行，阻碍亚太盟国利用多边机制与美国进行贸易政策协调。特朗普通过拒斥多边国际机制、减少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所需的支出，以达到扩大本国收益的目标，折射出其在极端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驱动下对自由国际主义范式的抛弃。^[2]然而，对于韩国、澳大利亚等中等强国而言，基于多边规则和机制的国际秩序对全球贸易和繁荣至关重要，也有利于这些国家从中获利。^[3]因此，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和“反全球化”行为与亚太盟国的诉求背道而驰，进一步扩大了联盟内部的利益分歧。

二、美国亚太联盟调整新特点

在第一任期，特朗普出台了以遏制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印太战略”，并在其指引下强化了与亚太盟国的轴辐安全体系。与此同时，为向亚太盟国

[1] Stephen Costello, "Trump Could Get a Win with North Korea This Time, by Taking Lessons from His First Term," *Quincy Brief*, No.75, 2025, p.2.

[2] 朱锋:《特朗普第二任期促发的世界主要矛盾:美国走向修正主义》,载《国际观察》2025年第3期,第34页。

[3] John Blaxland, "Middle powers such as Australia relied on the rules-based order, but that's in doubt. Here's what we must do," *The Guardian*, February 25,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commentisfree/2025/feb/26/australia-china-us-relationship-trump-administration-impact>.

转嫁负担，美国频繁对盟国施压，将共同价值观边缘化，反映出其实用主义的联盟政策倾向。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亚太联盟政策既有延续也有突破——在延续遏制打压中国的主线任务及强调联盟责任“对等性”的同时，“交易主义”特质愈发凸显，联盟功能范畴进一步收窄，表现为以下三大新特征。

（一）更加强调联盟的“对等性”原则

在非对称联盟框架中，主导国通常会投入更多的安全资源并提供公共产品，以换取成员国的战略自主让渡；成员国则为获得主导国的安全保障，牺牲一定的自主性，配合其战略行动。^[1]长期以来，美国与盟国的互动几乎都践行着这种“安全—自主交易”模式。然而，特朗普质疑该模式的效益平衡，认为美国承担了大量的安全投入，却因盟国贡献不足及联盟功能性缺陷导致美国从中获益有限。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期间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表示，美国为韩国安全支付了大部分费用，而韩国却借此机会发展成富裕国家^[2]，反映出其对联盟内部责权划分的不满。不过，鉴于亚太联盟在制衡中国方面的不可替代性，特朗普选择以“改造”替代“抛弃”，通过调整亚太联盟内部的权利与义务分配，使其更为“对等”，从而在维持联盟功能的同时减少美国的投入。

特朗普主要从三个方面推动“对等性”原则的实现。一是要求亚太盟国承担更多的联盟责任。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曾不断施压日本、韩国提高驻日、驻韩美军的防务费分担份额。再次执政后，特朗普又就防务分担问题对日韩澳提出要求。他抨击美国对日本的防务承担全面责任，而日本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义务保护美国，甚至还从联盟中获得巨大收益。^[3]同时，

[1]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5, No.2, 1991, pp.904-933.

[2] James M. Lindsay, “Election 2024: Trump Talks Foreign Policy With Time Magazin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y 3, 2024, <https://www.cfr.org/blog/election-2024-trump-talks-foreign-policy-time-magazine>.

[3] 「トランプ大統領が日米同盟に不満「日本は我々を守る必要はない」」、朝日新聞、2025年3月7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T367F6NT36UHBI004M.html>。

他还暗示将围绕2024年10月美韩签订的第12次《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进行谈判。在特朗普看来,美国为日韩等亚太盟国提供的安全保障远超对方为美国带来的战略价值,因此要求这些国家承担更多安全义务,以减少对美国安全保障的“过度索取”。二是要求亚太盟国更加积极地配合美国行动,从而与美国所提供的安全保障相匹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强调,“我们希望能在太平洋地区随时随地发挥领导作用,并且盟友和合作伙伴能与我们团结一致”。^[1]2025年3月24日,在日本正式成立“统合作战司令部”之际,美国启动了驻日美军指挥架构向“统合军司令部”转型的第一阶段工作。随后,赫格塞思又表示,“美国将向东京和驻日美军司令部增派人员,并赋予其指挥官更多权力”。^[2]美国通过同步升级指挥控制框架,不仅实现了同盟指挥系统的深度融合,同时确保日本在强化独立作战指挥能力的过程中,持续巩固其作为美军在西太区域战略力量投射核心枢纽的功能定位。三是要求亚太盟国提高自身防务能力。早在第一任期时,特朗普就曾公开表示,“如果日本和韩国能保护自己免受朝鲜威胁,那会更好,否则应该向美国支付更多费用”。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继续向亚太盟国释放“鼓励”提升军事实力的信号。在3月的美日防长会晤上,两国重申了加强美日同盟威慑效能的立场,并特别指出日本应以“负责任的态度推进自身防务能力的提升”。^[3]5月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赫格塞思宣称,“亚太盟国可以而且应

[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cretary of Defense Pete Hegseth Press Conference Following NATO Ministers of Defense Meeting in Brussels, Belgium,” February 13, 2025, <https://ww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4066734/secretary-of-defense-pete-hegseth-press-conference-following-nato-ministers-of/>.

[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cretary of Defense Pete Hegseth Joint Press Conference With Japanese Defense Minister Gen Nakatani in Tokyo,” March 29, 2025, <https://ww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4139247/secretary-of-defense-pete-hegseth-joint-press-conference-with-japanese-defense/>.

[3]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cretary of Defense Pete Hegseth Joint Press Conference With Japanese Defense Minister Gen Nakatani in Tokyo,” March 29, 2025, <https://ww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4139247/secretary-of-defense-pete-hegseth-joint-press-conference-with-japanese-defense/>.

该升级自己的防御能力……以增强联盟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1]在“美国优先”原则主导下,特朗普专注于重振美国军事实力以保障自身的绝对安全,对投入大量资源保护盟国缺乏意愿;然而基于维持对华战略威慑的实际需求,其又要求亚太联盟体系必须具备“更强大的遏制能力”,因此推动盟国依赖本土资源发展防务力量,以实现联盟整体作战能力的结构性提升。

(二) 更加突出联盟的传统功能

自冷战结束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皆认为,联盟体系对于构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这种秩序能够有效维护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及其全球领导地位。然而,特朗普的执政标志着对这种传统的颠覆:他将联盟的核心价值重新定位为地缘政治竞逐的工具,这与其颠覆现存全球秩序的反建制特征相契合。尽管2024年的共和党党纲在涉及联盟时,仍承诺“将通过加强联盟的方式来增强美国实力,以确保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未来”^[2];国防部长赫格塞思也公开表示“本届政府深信联盟”,声称“(美国)会与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合作,以确保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3],但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继续推行其“美国优先”的核心原则——该政策导向一贯将美国短期的经济利益置于多边制度合作与国际秩序稳定性需求之上——这无可避免地对现行国际规则和秩序造成持续冲击。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可能进一步弱化联盟在秩序维系、共识塑造等方面的作用,更聚焦于其传统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助力美国霸权护持的功能。

[1] Helen Davidson, “Pete Hegseth calls on Asia to boost military spending in face of ‘imminent’ threat from China,” *The Guardian*, May 31,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5/may/31/pete-hegseth-calls-on-asia-to-boost-military-spending-in-face-of-imminent-threat-from-china-us-defence-secretary>.

[2]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2024 Republican Party Platform*, July 8, 2024,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2024-republican-party-platform>.

[3]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cretary of Defense Pete Hegseth Press Conference Following NATO Ministers of Defense Meeting in Brussels, Belgium,” February 13, 2025, <https://ww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4066734/secretary-of-defense-pete-hegseth-press-conference-following-nato-ministers-of/>.

具体来看,亚太联盟更加聚焦传统功能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不断突出硬实力在联盟中的关键作用。在谈及联盟合作时,赫格塞思强调,“价值观很重要,但是硬实力才是无可替代的,没有什么比硬实力更重要”,并指出亚太联盟的首要任务在于“增强成员国的综合实力以优化联盟威慑效能”。^[1]特朗普也公开表示,对亚太盟国的期望是“在战略规划和军事行动层面发挥直接且具实质意义的作用”。^[2]这反映出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将联盟关系明确定位为一种有效的战略竞争工具,而忽视其在凝聚共识、深化经济合作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二是重点维护与具有关键战略价值的亚太盟国的关系。相较于其他亚太盟国,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即与日本开展高频互动,并且未来还将持续深化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亚太地区多边机制。^[3]近年来,美日同盟已从“用于保护的同盟”转变为“用于力量投射的同盟”,在美国亚太盟伴体系中发挥着主导性与支撑性的双重作用。^[4]通过优先深化与日本的核心纽带作用,美国能更高效地整合亚太联盟体系,实现其战略价值最大化。与此同时,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也重点经营菲律宾:国防部长赫格塞思不仅将菲律宾作为首访的亚太盟国,还在访问期间宣布在菲部署第二套“堤丰”中程导弹系统,这被外界视为美国“保卫”菲律宾的强烈信号。^[5]同时,美国在多个场合表达对菲律宾防务能力建设及其所谓“南海主张”的支持,并计划

[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cretary of Defense Pete Hegseth Press Conference Following NATO Ministers of Defense Meeting in Brussels, Belgium,” February 13, 2025, <https://ww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4066734/secretary-of-defense-pete-hegseth-press-conference-following-nato-ministers-of/>.

[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Trump Vows to ‘Extinguish’ ISIS, Rebuild U.S. Military,” March 1, 2017,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1098444/trump-vows-to-extinguish-isis-rebuild-us-military/>.

[3] 王帆、梁居宸:《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外政策前瞻》,载《现代国际关系》2025年第1期,第39页。

[4] 赵明昊:《美国“印太”盟伴体系中的日本角色探析》,载《日本学刊》2024年第4期,第9页。

[5] Richard Javad Heydarian, “Hegseth dangles second Typhon missile system for Philippines,” *Asia Times*, April 1, 2025, <https://asiatimes.com/2025/04/hegseth-dangles-second-typhon-missile-system-for-philippines/#>.

于2026年前在菲律宾苏比克湾建立弹药联合生产设施和大型预置战备仓库。^[1] 菲律宾的核心价值源于其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有利于美国深度介入南海地区事务，搅动中国周边局势，进而在对华竞争中达到“以小博大”的效果。

三是对亚太多边机制持功利性的参与态度。一直以来，特朗普对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多边机制热情不高，但是高度关注地区机制在整合军事力量和实施战略威慑方面的作用。特朗普在第一任期退出了TPP，几乎不参与东盟峰会，减少美国在东亚峰会、东盟会议上的存在。^[2]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在第一任期重启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深化美日韩三边防务合作；在第二任期伊始即表态要加强美日韩、美日菲、美日澳等框架下的安全合作。2025年5月30日，国防部长赫格塞思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防务领导人会面，宣称支持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在应对地区安全挑战中发挥更大作用，但会议声明却明确指涉中国南海行动，暴露出美国欲借东盟国家力量搅动南海局势的真实意图。这种机制参与的选择性印证了特朗普政府的基本逻辑：更关注利用地区机制对抗战略竞争者、服务美国地缘战略目标，而对机制在加强政治对话、稳定区域秩序等方面的建设性功能则相对漠视。

（三）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逐渐分化

特朗普重新执政以来，美国与亚太盟国在安全领域合作较为紧密，而经贸领域摩擦不断，凸显联盟内部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逐渐分化的结构性特征。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通过高层互动重申安全承诺、协调双方地区安全事务立场，并密集开展军方对话和联合演习。尽管特朗普表现出向亚太盟国转移防务责任的意图，但当前对亚太联盟安全合作的影响有限，

[1] 参见 Aaron-Matthew Lariosa, “Philippine Navy to Open New Bases in Subic Bay, Mindanao,” Naval News, May 23, 2025, <https://www.navalnews.com/naval-news/2025/05/philippine-navy-to-open-new-bases-in-subic-bay-mindanao/>; Aaron-Matthew Lariosa, “Congress Eyes Ammunition Plant at former U.S. Naval Base in the Philippines,” USNI News, June 24, 2025, <https://news.usni.org/2025/06/24/congress-eyes-ammunition-plant-at-former-u-s-naval-base-in-the-philippines>等。

[2] 翟崑：《特朗普 2.0 冲击下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发展前景》，载《当代世界》2025 年第 2 期，第 18 页。

总体呈现强化趋势。然而在经济领域,美国与亚太盟国的合作却频频遇阻且分歧不断扩大。不同于拜登政府时期通过推进“印太经济框架”“民主供应链联盟”等机制、深化与亚太盟国的产供应链合作等做法,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倾向于利用关税壁垒、限制进出口等贸易保护主义手段重振本土产业,增强美国经济实力,这对亚太国家的经济利益造成严重冲击。在双边经贸关系中,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导致亚太盟国出口减少、经济增长预期下滑,招致盟国批评。澳大利亚政府指责特朗普的贸易行为“违背美澳两国持久友谊的精神”^[1],韩国政府则警告称这些举措会“破坏美韩同盟间的信任”。^[2] 在多边经贸合作中,特朗普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机制态度消极,这与亚太盟国希望加强区域内经济合作,以获得更大经济收益的预期相背离。与首个任期相比,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扩大了加征关税的范围和力度、减少了豁免比例,这意味着美国与亚太盟国在经贸领域的矛盾相较之前将更为尖锐。

在商人思维的影响下,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呈现出明显的“交易性”特征,聚焦于短期收益,缺乏系统、长远的外交规划。其“既要又要”——追求“双向即时收益最大化”的交易性心理使其没有意愿在“平衡国际收支”的经济目标和“强化对华威慑”的安全目标间进行政策协调,致使亚太联盟内部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出现一定程度的脱钩。对于亚太盟国而言,在外部威胁感知较强和自身防务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它们仍依赖于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因而会积极响应美国的安全合作。在特朗普赢得选举后不久,日本、菲律宾等亚太盟国首脑便寻求与特朗普直接对话,以期获得对方明确的安全承诺。日本政府官员公开表示,“无论是从条约还是从实际存在层面来看,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取代美国对日本的重要地位”。^[3] 这反映出亚太盟国对美

[1] “‘Entirely unjustified’: Albanese blasts Trump as tariffs smash into election frame,” *Brisbane Times*, March 12, 2025, <https://www.brisbanetimes.com.au/world/north-america/trump-rules-out-tariff-exemption-for-australian-steel-aluminium-exports-20250312-p5litiz.html>.

[2] 《政府确认韩国是美国敏感国家:“我们严肃对待这一问题……积极谈判”》,韩联社,2025年3月15日, <https://www.yna.co.kr/view/AKR20250315035000504>。

[3] Paulina Smolinski, “U.S. mulls expanding military ties with Japan despite Trump's criticism of the alliance,” CBS News, March 27, 2025, <https://www.cbsnews.com/news/us-japan-military-defense-ties-trump-china-threat/>.

国较高的安全需求。与之不同，亚太盟国在经济领域有更加多元化的伙伴选择，尤其是在美国的关税政策大幅削减它们的对美合作收益预期后，它们在利益驱动下更主动地强化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菲律宾政府宣布将加强与东盟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共同应对当前的关税危机。^[1]日本则同中国召开经济高层对话，与中韩举行经贸部长会议，围绕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促进区域内经贸合作等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

短期来看，低政治领域的摩擦未必能直接改变高政治领域的合作进程，但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分化的趋势将愈发明显。在特朗普“美国优先”理念影响下，其“孤立主义”外交倾向使亚太盟国对“被抛弃”的担忧显著增加，这让美国在联盟关系中获得了更大的主导权。正如美国前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所言，尽管特朗普政府与亚太盟国间的经济和外交关系紧张，但双方的防务合作仍在不断深化，其延续性远大于中断可能。^[2]然而，长期来看，经济利益上的分歧会逐渐削弱联盟内部的战略互信和立场协调，进而延缓盟国间的安全合作进程。

三、美国亚太联盟政策调整的影响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亚太联盟政策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美国国内的党争、极化等问题加剧导致国会陷入“孤立主义”与“全球主义”的政治分野和战略拉扯之中^[3]；同时，特朗普极端的个人主义做法进一步激化党内冲突，扩大了共和党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4]尽管受制于府会矛盾与党内裂痕，

[1] Hai Hong Nguyen, “Parsing ASEAN’s Response to President Trump’s ‘Reciprocal’ Tariffs,” *The Diplomat*, April 8, 2025, <https://thediplomat.com/2025/04/parsing-aseans-response-to-president-trumps-reciprocal-tariffs/>.

[2] Ely Ratner, “The Case for a Pacific Defense Pact,” *Foreign Affairs*, May 27,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case-pacific-defense-pact-ely-ratner>.

[3] 汪曙申、刘匡宇、陈桂清等：《特朗普 2.0 时期台海局势走向综论》，载《台湾研究》2025 年第 1 期，第 25 页。

[4] Paul Heideman, “Trump’s Takeover of the Republicans,” *Catalyst: A Journal of Theory and Strategy*, Vol.8, No.4, 2025.

但从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与亚太盟国的互动及其政策惯性中，仍可研判美国对亚太联盟调整的基本趋势。目前来看，这一调整会对美国亚太联盟自身、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及中美关系态势产生影响。

（一）削弱亚太联盟的稳定性

自重新执政以来，特朗普明确将亚太联盟的战略目标定位为“威慑战略竞争对手”，在对华战略竞争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推动联盟聚焦于对中国的防范和遏制。为此，特朗普不断向亚太盟国转嫁防务责任、施压对方在经济利益上大幅让步。而此种做法不仅侵蚀联盟互信基础、削弱其稳定性，而且导致其安全合作面临更多曲折和反复。

在安全领域，特朗普为了实现防务责任转移，不惜以放弃联盟承诺相要挟。特朗普在其首个任期内就频繁地向亚太盟国发出撤军威胁，迫使对方提高防务开支；其第二任期开启后又指责亚太盟国在对美贸易中占据较大优势，暗示将借防务问题施压对方在经贸问题上让步，这实质上是一种轻视联盟条约的行为。适当的联盟声誉是联盟管理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而特朗普在联盟承诺上的反复无常不仅侵蚀美国自身的联盟声誉，也给其后续的盟国间协调带来更大困难。

在经济领域，特朗普以“贸易公平”为名，采取高关税政策来扭转对美贸易顺差。亚太盟国作为其主要贸易伙伴，无可避免地会受到冲击，这将迫使其转而寻求强化与中国、东盟等区域内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合作，导致亚太盟友在安全与经济领域将面临着更大的政策张力。长远来看，相较于安全利益上的协调，经济利益涉及盟国国内更多元化的主体，利益关系更为错综复杂。这也意味着美国在协调盟国间的经济利益分歧时将面临更多挑战。

此外，特朗普在国际事务上表现出的模糊立场，已引发亚太盟国对其外交政策可靠性的质疑。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促使盟国在缺乏明确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更积极地追求战略自主。

（二）加剧亚太地区的地缘竞争态势

特朗普第二任期将继续以遏压中国为战略目标来设计与实施亚太联盟

政策。不同于拜登政府在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运用联盟力量来对抗中国，特朗普更聚焦于联盟的硬实力和传统安全功能。在此背景下，特朗普会不断要求亚太盟国增加军费开支、扩大美制武器采购，推动提升盟国间的军事协作水平。这将加剧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态势，冲击现有地区安全架构，并进而引发更多安全风险甚至危机。借助盟国之力搅动南海、台海局势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用以掣肘中国的主要手段。特朗普在第二任期还会继续拉拢亚太盟国，在涉华安全议题上挑起争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国务院删除了“美台关系事实清单”中“不支持‘台独’”的表述，美国《国防战略临时指南》将“阻止中国大陆攻台”列为国防战略的优先事项。^[1]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也意欲借扩大军演规模、升级合作机制、设置核心议程等手段，将更多域外国家拉入其中，进一步发挥该议题在对抗中国中的“杠杆作用”。在强化“印太”战略部署上，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对印度的拉拢更加积极：特朗普上任伊始即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晤，副总统万斯（James David Vance）也实现了对印度的访问。双方不仅在多个领域达成合作共识、签署新的《21世纪美印主要防务伙伴关系框架》，还表达了“对印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高度关切”。这透露出特朗普重视加强对印度的笼络以进一步发挥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中关键支点作用的意图。同时，特朗普会更多地从“交易主义”视角出发，将涉华敏感议题作为对华博弈时的外交姿态展示“窗口”和谈判工具，其立场因而更加反复无常，致使地区安全局势起伏不定。

此外，特朗普政府深化与亚太盟国的双边及多边安全合作，以此介入地区安全事务，实质上削弱基于平等协商、对话合作的亚太多边安全机制的作用发挥。以南海地区为例，东盟国家借助以东盟为核心的安全对话机制，推动《南海行为准则》（COC）的磋商进程，不断推进南海地区的安全治理；而美国则利用美菲同盟及美日菲三边机制，不断挑起地区争端。这种行为不仅直接冲击东盟主导的区域治理实效，更对体现多边主义原则的“东盟

[1]《施压盟友增加军费，涉台被列优先事项，美媒曝光五角大楼机密文件》，环球网，2025年3月31日，<https://mil.huanqiu.com/article/4M4sxOUWgPM>。

中心地位”安全规范构成挑战。长远来看，这种机制对抗将持续侵蚀亚太地区安全稳定的结构性基础，增加地区安全秩序走向碎片化、阵营化的风险。不过，随着美国自身的联盟声誉持续恶化，亚太盟国在挑起或参与地区争端方面将变得更为谨慎，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地区安全秩序的维系。

（三）中美关系面临更多变数

从特朗普任命多位对华强硬派人士担任内阁成员，到反复对华征收高额关税、扩大针对中国企业的“出口管制清单”、进一步收紧对华芯片出口限制、限制中美人文和教育交流等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会将对华战略遏制力度提升至新水平。特朗普政府将亚太联盟视为对华竞争的关键工具。鉴于其高度聚焦联盟的安全合作且在联盟管理中更多依赖施压等强硬手段，未来，亚太盟国与美国在安全领域的谈判空间可能进一步缩小，联盟绑定程度则会持续加深，这将导致中国周边安全面临更大挑战。

但也应看到，亚太联盟内部日益扩大的利益分歧为中国突破联盟“围堵”提供了契机。美国亚太盟国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存在温差。与美国有所不同，美国亚太盟国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和经贸往来，例如，2022年以来中澳高层交往逐渐回到正轨，2024年泰国新政府上台后致力于加强中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些都表明亚太盟国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存在差异，双方难以在对华竞争中完全保持一致。与此同时，亚太盟国与美国的利益契合度可能因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防务责任转移行为有所下降，而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则会因对方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外交倾向有所减弱。这为亚太盟国在中美战略博弈中选择“对冲”策略而非“倒向美国”提供更强的动力。^[1]此外，亚太盟国国内局势的变化也影响着其对美立场。澳大利亚研究所的民调数据显示，在特朗普重新执政后，31%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美国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超过了选择中国（27%）和俄罗斯（27%）的人数占比。^[2]在2025年联邦选举中，澳大利亚工党公开

[1] 韩献栋、王二峰、赵少阳：《同盟结构、威胁认知与中美战略竞争下美国亚太盟友的双向对冲》，载《当代亚太》2021年第4期，第28—66页。

[2] “Poll: Trump a greater threat to world peace than Putin or Xi,” The Australia Institute, March 4, 2025, <https://australiainstitute.org.au/post/poll-trump-a-greater-threat-to-world-peace-than-putin-or-xi/>.

反对联盟党“效仿”特朗普的行为，成为其获得多数选票的重要原因。^[1]在韩国国内，尹锡悦政府“亲美疏中”的外交政策引发民众不满，李在明新政府或将以此为鉴，在中美之间采取更加务实的立场。总的来看，随着来自美国的压力持续增强，亚太盟国国内“反特朗普”情绪将有所上升，对中美两国的威胁感知差异逐渐缩小，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亚太盟国采取对美国“一边倒”的外交取向。

结 语

在特朗普强调“对华全面竞争”和“联盟战略威慑作用”的情况下，亚太联盟将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工具，导致中国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外部挑战增大。同时，美国与亚太盟国在经贸问题上摩擦增多，在地区安全事务和对华立场上分歧扩大，致使亚太联盟内部出现裂痕，凸显美国与其亚太盟友并非铁板一块的事实。美国的亚太盟国几乎都在中国周边，与中国彼此利益深度交融。为此，中国一方面要以经贸合作为纽带，深化与美国亚太盟国的利益联系。尤其是在亚太联盟内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不断分化的趋势下，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借助伙伴关系建设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框架，加强与美国亚太盟国的经贸往来。在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稳定、恶化贸易投资环境的情况下，协同地区内更多国家，推动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地区大市场的建立，稳定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环境。另一方面，中国应加强与美国亚太盟国的政治对话，表明坚决反对美国在亚太搞阵营对抗和“新冷战”、坚决反对美国搞联盟体系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立场，多做增信释疑工作，特别是要警惕美国主导的亚太联盟及小多边机制对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侵蚀，确保与亚太国家的政治沟通渠道畅通，并借助双边、多边平台澄清对中国的战略误解。总之，中国需要坚持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

[1] 林铎：《澳大利亚联盟党的“中国牌”打不动了》，载《世界知识》2025年第10期，第44—45页。

观为指引，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战略支撑，大力推进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此外，中国应继续推动国际多边机制的建设与发展，抵消美国频繁退出国际机制所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中国可携手伙伴国家，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多边体系；继续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等多元主体的战略互信与务实合作，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更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收稿日期：2025-04-17】

【修回日期：2025-06-27】

（责任编辑：邢嫣）